

自由主義與中國

● 汪榮祖

自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、社會主義、共產主義同為二十世紀超越國界種性的巨大思想潮流和政治運動，都曾經激盪風雲、震動一時。在中國，自由主義雖輸入較早，卻最不成氣候，未曾一日行之於神州大地。是以，討論自由主義與中國此一命題時，往往集中於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問題，或何以自由主義不能在中國成功地發展？再由於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的相關性，中國自由主義的失敗又牽涉到中國民主政治運動失敗的問題。

馬克思主義不也是一個外國器官嗎？何以能移植到中國來呢？

傳統文化與自由主義

從失敗的事實找失敗的原因並不難，一方面可從豐富的傳統文化中找出許多專制的因子，以證明中國的文化傳統與自由主義的價值格格不入。不過，自清朝末年，尤其是民國以後，中國的傳統遭到史無前例的衝擊，以致於崩潰。「五四運動」更是一思想解放運動，新文化生焉。何以在崩潰中的傳統文化仍然阻礙自由主義？如何阻礙？以及阻礙到何種程度？並沒有令人信服的答案，只不過是將「傳統」與「現代」作粗疏的對比，以證明兩者之格格不入。中國科學的不發達，長久以來也一直歸罪於中國的傳統文化，認為二者互不相容，但自李約瑟（Joseph Needham）的煌煌巨著多卷本《中國科技史》問世以來，至少證明中國的傳統文化並非與科學絕緣，其中實有不少科學的成就。問題只是十六世紀以後何以中國的科學未能如西方之突飛猛進。但這個問題已顯然不全是文化問題了。科學如此，民主與自由主義也未必與中國的傳統文化完全絕緣，中國的文化傳統更未必不能包容自由主義與民主。

另一方面可從中國的紛紜現實中找出許多混亂的現象，與西方社會相比，以證明自由主義與中國格格不入，兩不相配。從此一觀點出發，有位美國學者認為自由主義乃一「移植的西方器官」，無法在中國的身體上運作。但是此種生

物性的解釋，完全否定了文化可以傳播與交流的事實。馬克思主義不也是一個外國器官嗎？何以能移植到中國來呢？

嚴復等思想家的自由觀

較為具體的研究則是從晚清以來的自由主義者入手。嚴復應是中國第一個有系統介紹西方自由主義思想者，史華慈（Benjamin I. Schwartz）曾指出，嚴復在介紹十九世紀英國自由主義思潮時有意將「自由主義」作為富國強兵的手段，而不是將自由主義作為目的，介紹到中國來，但是此種「曲解」自由主義，有重要的歷史意義，展示了當時嚴復或中國的心態。在內亂外患交迫之下，不管是那一類型的知識分子，都不得不把國家利益放在個人自由之上。當然不僅僅是嚴復，其他的進步知識分子如梁啟超由個體自由轉向群體建立，章太炎講究「大獨」而斥純為私利的「小獨」，陳獨秀從自由主義走向馬克思主義，即使胡適也漸從強調「自由」趨向強調「容忍」。連被自由主義吸引的中國思想家都不以自由主義為純正的追求目標，則自由主義又安能在中國土地上成長？用李澤厚的話說，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於「啟蒙」之後，被救亡意識所征服，以致於又淹蓋了啟蒙！近代西方的自由主義是隨「啟蒙」而介紹到中國的，又隨「啟蒙」而不彰。

連被自由主義吸引的中國思想家都不以自由主義為純正的追求目標，則自由主義又安能在中國土地上成長？

不過，僅僅從思想上去理解自由主義的失敗仍然不夠。嚴復在介紹自由主義時，亦非全心全意在富強。他譯穆勒（John S. Mill）的名著《自由論》（*On Liberty*），初為《自繇論》，以免「自由」一詞可能引起的誤解，特用一古字以區別之，後更進一步界定為「群己權界論」，完全免去「自由」一詞。這充分表達了他介紹自由主義思想時的謹慎心情。為甚麼如此謹慎？因他深知自由主義思想需要條件，必須落實於政治、社會、經濟等條件之中。他一再強調開民智的重要，民智不開根本不能談自由主義，但開民智必是一長程計劃，所以嚴復所指出的中國到自由之路是漫長而漸進的，在過渡期中必須先建立群體的秩序。

中國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的發展

秩序包括所有自由主義思想家所最重視的法治，而法治不能立即制定、付諸施行，否則與傳統中國的法家何異？法治必須自然地、逐步地形成，庶幾能以法治保自由，而不以治法害人權。但法治之自然與逐步形成，須靠社會、經濟，以及政治結構的蛻變相配合。自晚清以來，這些結構的蛻變都隨着舊體制的解體而進行着。清末的立憲，地方諮議局與議會的出現，新式商團的組織，洋學堂的創辦，自由結社的蜂起等等，在在促使中國社會、經濟、政治的多元化，為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奠下一點物質基礎。

但是這一點物質基礎被近、現代不斷的革命運動不斷地摧殘。「革命」一詞的近代意義，無非是暴力與破壞，但近、現代中國的仁人志士常把革命視為最

神聖的目標，以革命為進步的代名詞，反革命成為惡極的罪狀。大家歌頌辛亥革命，但辛亥革命實際上破壞了正在茁壯的立憲基礎，二次革命反而助成了袁世凱的軍事獨裁。「五四運動」為又一次的革命鋪了路，又一次的革命摧毀了由下而上重建民主基礎的聯省自治運動，並產生了一黨專政的訓政，導致國共兩黨的長期鬥爭，使上下組織轉向一元化與專制化。胡適及其《新月》朋友揭出自由法治與人權的大旗，與一黨專政相抗，不過是以卵擊石而已。九一八以後，自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對抗即隨外患日亟而消逝。

抗戰爆發之後，國難當頭，國民黨必須稍為收斂一黨專政的架式，團結黨外政治勢力。先有「廬山談話會」，繼有「國防參議會」，以及「國民參政會」，包容了共產黨在內的一切異己分子。戰時的「國民參政會」尤其可說是群彥畢至，其中有不少自由主義的信仰者。是以，日本入侵之危機為國內政治多元化提供了一些契機。戰爭一旦結束，這些契機便大可發展為自由與民主的政治機會。

因此，抗戰結束後數年間實為中國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的最佳時刻。中國八年抗戰的勝利，乃二次大戰同盟國勝利的一部分。從意識形態上看，大戰的結束使法西斯主義徹底崩潰，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聲勢大張，形成與社會主義對立和抗衡的形勢。從權力政治上，大戰的結束迫使美、蘇二強的鬥爭。此一世界性意識形態與權力政治的變化，多少可反映到國內國共兩黨鬥爭上來。國共鬥爭造成內戰的危機，但也給抗戰期間形成的中間勢力製造契機，不僅可從中平衡國共權力，避免一黨專政，更可進而由聯合政府促進政治的民主化、自由化以及多元化。

事實上，在抗戰期間，國共之外的政治勢力已有「中國民主政團同盟」的組織，各個政團入盟，為團體委員制。1944年9月19日，此一同盟改組為「中國民主同盟」，簡稱民盟，改以個人名義加入。盟員雖有跨黨的現象，但民盟的組織已具完整的政黨形式，設中央委員會和常務委員會，主席領之，支部及總支部分設於雲南、四川、重慶、廣東、華北、西北、東南各地，出版《民主報》刊物。還應該指出的是，民盟之中頗有自由主義分子參加。

1945年8月，於抗戰勝利前夕，民盟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，提出「民主統一、和平建國」的口號，要求結束一黨專政，要把中國建設成一道地的民主國家，並發表明確的政綱，主張議會制、責任內閣制、司法獨立、地方自治、軍隊國家化、普及教育、男女平等，以及學術自由等等，類此與自由主義者的主張並無二致。

更具自由主義色彩的是儲安平之《觀察》集團。《觀察》周刊籌備於重慶，於1946年9月在上海創刊。儲氏集合了70餘位頗有名望的學者與知識分子為基本撰稿人，自稱「自由分子」、「自由主義者」，以及「自由主義者刊物」，以自由、民主、進步、理性為宗旨，一紙風行，銷售至六萬冊之多，於1946至1949年間形成強大的自由主義輿論。

強大的自由派輿論不僅可以影響廣大的人心，而且可以助長國共之間第三勢力的聲勢。但中間政治勢力的發展有一先決條件，即必須防止國共內戰，而內戰是否能夠防止主要在於執政的國民黨能否作徹底的政治改革。戰後美國對華政策強調中國和平，鼓勵國民黨改革，給中國自由主義者帶來更多的希望與

抗戰結束後數年間實為中國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的最佳時刻。

樂觀。美國總統杜魯門並派極具時望的馬歇爾（George Marshall）將軍為特使來華調停國共內爭。1946年元月，不僅國共停戰，「政治協商會議」也在重慶召開，各黨各派共商國家大事，制定方針，強調政治的民主化、軍隊國家化，以及和平建設。經過22天的協商，達成決議，提出改組政府、修改民國廿五憲法，建立憲政。在憲政完全建立之前，由一包含各黨各派的國務院治理國事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一決議頗具自由主義色彩，獲得馬歇爾的讚賞，蔣介石也在口頭上尊重此一決議，並願付諸實施。

內戰背景下自由主義的命運

如果能按此決議逐步實施，不僅內戰可免，聯合政府可成，而且自由主義的民主政治也必然可期。當然，中間勢力或自由主義者絕不可能很快地取得政權，但在聯合政府之中可以調節制衡，再配合輿論，自能漸漸走向民主政治之路。然而此一頗具自由主義色彩的決議終未能付諸實施，和解失敗，內戰繼起。馬歇爾將談判破裂歸罪於國共兩黨中的「極端派」，當然是外交辭令。當時最關鍵的人物應是蔣介石，他大權在握，在美國的壓力下不得不敷衍和談，侈言改革，但骨子裏完全不能接受聯合政府，也不信任民主程序。無論民主程序或聯合政府，在他看來，都是為共產黨奪權鋪路。蔣介石破壞聯合政府的計劃，捲入甚深的美國人心中自然有數，1949年美國國務院發表的白皮書，終於道出真相：「蔣委員長在拖延談判的掩護下，一意執行其既定的武力政策。」（The Generalissimo was certainly following a definite policy of force under cover of the protracted negotiations.）

戰後美國對華政策強調中國和平，鼓勵國民黨改革，給中國自由主義者帶來更多的希望與樂觀。

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一意武力解決，無心改革，當然引起自由主義派的嚴厲批評。儲安平及其《觀察》尤為自由派批評的重鎮，比之當年的《新月》，批評更為廣泛，更為尖銳，自由主義的旗幟也更為鮮明，又是一場自由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思想鬥爭。自由主義派對國府初寄希望，終於失望，甚至痛恨。國府對自由主義派初尚尊重，終視為共產黨同路人而鎮壓之，事實上硬將自由派推向共產黨陣營。

有些自由主義者在國府壓迫下，想做法當年的「共產國際」，來一個「民主國際」，盼望國際上的民主勢力能予援手。其實美國是國際上最強大的民主勢力，又捲入中國國內事甚深，且對蔣氏政權極有影響力，何以美國未能給中國自由主義以及民主事業極需的援手呢？張東蓀曾建議中國自由主義者組團赴華府遊說，亦未成為事實。在此牽涉到理想與現實的問題。講理想，美國自應全力扶助中國的自由主義與民主事業，但在現實上美國又大力扶持反共親美的蔣氏政權，不願加諸太大的壓力，以致和平破裂，改革無成。不少自由主義者很明白美國的世界戰略，要把中國作為反蘇的一個主要基地。故錢端升呼籲對美蘇都要保持距離，以策安全；傅雷指出美蘇各有其國家利益，中國亦需注意本國利益；費孝通認為美國只要一親美的中國，許德珩更直言中國不能成為美蘇的戰場。當時美國右派勢力日漲，右派的反共反蘇言論更與蔣介石的宣傳若符合

節，而與中國自由派的見解格格不入。像自由派對右派大將蒲立德（William C. Bullitt）的批評，以及對魏德邁（Wedemeyer）來訪的冷漠，在在可見中國自由主義者與美國政策間的鴻溝。

除了美國的對華政策外，中國自由主義者也不滿美國的扶日政策，以及美軍在華的驕橫。儲安平曾說，外國的干涉是可恥的，但如能促進民主，未嘗不是好事。但美國對中國的民主事業只有「口惠」而無「實至」，只成為蔣介石的朋友，而不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朋友。中國自由主義者對美國應親而不親，更不要說企望美援了。按着當時中國自由主義者的心情，對美國已是「鄙」而遠之。美國政府像蔣政權一樣，把自由分子推向敵對的陣營去了。

蔣介石一意用兵，美國對蔣氏的武力統一並不樂觀，但一旦內戰大起，美國因戰略所繫必然站在蔣方，終因蔣之失敗而失敗。中國自由主義者對蔣氏用兵也不樂觀，但對共產黨並無幻想。儲安平曾露骨地說過：「在國民黨統治下，這個自由還是一多少的問題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，這個自由就變成有無問題了。」可是國民黨喪盡民心，使民不聊生，又出師不利，最後逼得自由派希望國民黨早日垮台，以盡快結束內戰，換一新局面，他們真正成為共產黨的同路人了。

共產黨既以武力統一，共產黨一黨專政當然不可避免，自抗戰以來所成長的一點自由主義意識與結社又漸烟消雲散，一些中間黨派又名存實亡。表面上，馬克思主義消滅了自由主義。事實上，蔣政權與美國政府是扼煞中國自由主義的「幫兇」，使中國自由主義於抗戰後失去了成長的大好機會。

1930年10月17日

汪榮祖 1940年生於上海，台灣大學畢業後赴美留學，獲華盛頓大學博士，現任美國維珍尼亞州理工暨州立大學歷史系教授。汪教授是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專家，主要著述包括《史家陳寅恪傳》、《晚清變法思想論叢》、《康章合論》、《史傳通說》、*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—Rejuvenating a Tradition* 等及編著多種。